

四川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论文暨史料选

(二)

《四川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暨史料选》编辑组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5.07

四川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学 术 讨 论 会

论 文 暨 史 料 选

(二)

《四川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论文暨史料选》编辑组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四川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暨史料选(二)

《四川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暨史料选》编辑组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农垦总公司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8.25 200千字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11316·37

定价：1.50元

编辑组成员：

乔毅民 马功成 王迪先

潘清雍 肖志康 张迪明

吴应福

目 录

试论周恩来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历史功勋	傅佑全 (1)
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上层的统一战线	任孟良 (11)
周恩来与大后方的宣传文化统一战线堡垒	文天行 (17)
朱德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卓越贡献	冯明智 (29)
董必武在南方局	刘国龙 (38)
“一面色彩鲜艳的旗帜”	彭承福 单翥风 (48)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的统战工作	李 蓉 (59)
冯玉祥将军主持自贡盐场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纪实	陈 然 (73)
皖南事变与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	周 勇 (83)
回忆赵世兰领导的《大众壁报》社	省妇运史研究室 (99)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地方实力派	任一民 (102)
川北抗日救亡运动与重建党组织	郭 全 刘邦成 (115)
南华艺社的抗日宣传活动	张泽友 郭 全 (126)
“九一八”以后达县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唐敦教 (138)
涪陵地区人民在抗日救亡中的贡献	向同伦 (149)
四川大学抗日救亡运动初探	黎永泰 (159)

一所读书不忘救国的革命学校·····	宋德扬 王西林 (176)
正气歌成正气图·····	李永翹 (190)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侵华政策·····	杨仁珍 (200)
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供需关系·····	王洪峻 (215)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役政·····	程大力 陈廷湘 (231)
抗日战争时期自贡盐场增产加运与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 ·····	王柔德 (248)
附录：提交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补充目录·····	(259)

试论周恩来在实现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历史功勋

傅佑全

—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和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国际关系上,日本的称霸野心,危及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帝国主义之间在中国的争斗由此加深。在国内关系上,日本的疯狂侵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全国人民誓死不作亡国奴,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就连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周恩来指出:“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又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指出在日寇灭亡中国的局势下,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或敌对行动,都应当精诚团结,一致抗日。1935年12月,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方针。周恩来是制订这一方针的参加者和忠实执行者,他为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奔走东西南北,冒着生命危险与国民党多次谈判,为两党合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立后，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步是争取爱国领袖，第二步是争取地方实力派中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

张、杨两将军所属部队，系蒋介石派往陕西围攻红军，消灭共产党的杂牌部队，与蒋及其嫡系部队有深刻的矛盾，受蒋系的排斥和削弱。蒋想借此一箭双雕，既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又借刀杀人，排除了异己。张、杨两将军在进攻红军的几个月中，就报销了几师之众，损兵折将，不能不使张、杨两将军及其部下理智、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出路。尤其是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将军，东三省沦亡，自己和东北军流亡异乡，还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得不引起他深刻的反省。在民族敌人日益深入国土，举国上下一致抗日的形势下，有爱国气节的张、杨两将军愈加顺应民心，对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愈加不满，日益同情、理解、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我们党认真分析了他们的情况，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发表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了我党领导下的红军愿意首先同东北军联合起来，“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周恩来同志为了实现联合东北军抗日，总是抓住有利时机，作张将军及其部下的工作。我党做张将军的统战工作是从释放东北军将领高福源开始的。高原是张将军的警卫营长，和张的私交甚厚，1935年任107师916团团团长，10月榆林桥战役被红军生俘。周恩来同志在百忙之中，找高谈话，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希望他为抗日出力。周恩来的谈话，使高很受启发和震动。他改变了剿共立场，成为共产党的一位忠实朋友，并加入了共产党，当即决定返回西安，做张将军联共抗日

的思想工作，对张将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高回西安，毛泽东、周恩来又给张将军写信，希望张将军认清形势，共赴国难。通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极力争取，高的苦口婆心的说服，张将军也深明大义，愿与我党合作，并愿与我党会谈，提出亲自会见周恩来同志，洽谈合作事宜。

周恩来接受了张将军的邀请，于1936年4月9日与张将军在肤施(延安)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举行了正式会谈。当时的延安还在东北军的控制之下，那里还驻扎有大量的为蒋介石卖力的剿共军队。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为了民族的利益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指出，“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力量确实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在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谈了”。②周恩来既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屠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腥罪行，难于和人民一道抗日；但又公正地估计了蒋的力量和作用，如果能争取他抗日，是大为有益的，并表示愿意听张将军的高见。通过这次会谈，周恩来既向张将军阐明了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又与张将军商谈了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合问题，双方确定了一致抗日、互不侵犯、互帮互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抗日思想教育等具体协议。这次会晤，对张将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功的开端。

周恩来返回瓦窑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这次历史性会见的情况。他认为日本要独占中国，与英美发生了矛盾，英美又是蒋的总后台，他们支持蒋抗日是可能的，建议中共中央将我党

“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为了进一步提高张将军的认识，巩固延安会谈的成果，周恩来4月22日写信给张将军，诚恳忠告“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③希望张将军对蒋要提高警惕，有所戒备。这时阎锡山三十万大军堵截我东渡黄河抗日的红军，被红军打败。我党为了向全国人民表示抗日的诚意，决定将回击阎部的红军撤回黄河西岸，并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后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我们愿意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从此，我党正式放弃了“反蒋”口号，开始了“逼蒋抗日”的新政策，重申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重建国共合作的愿望。

1936年下半年，周恩来住在安塞县多次接见东北军、西北军的军官和民主人士，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写信给张将军，再次表明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告诫张将军，“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④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四十六人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在西北的高级将领，提出誓与他们合作到底，第一次把他们称为“抗日友军”。由于我们党的抗日政策转变和周恩来极力争取，使张、杨两将军首先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张、杨两将军曾多次“净谏”蒋介石以民族利益前途计，“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反而大肆训斥张、杨两将军，企图将张、杨部调离西北，解散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基础上结成的“三位一体”，预谋分别“吃掉”他们，这就激成了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也震动了解放区。党中央领导同志当夜得知事变的消息，都在半夜起床，格外兴奋。有的主张杀掉蒋介石，有的主张对蒋介石公审后杀掉以绝后患，有的主张严密地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人们对于这个十年内战的罪魁，杀我数十万同胞的蒋介石，主张杀掉、拘禁、公审，那时那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快就冷静下

来，认为杀了蒋介石非但不能达到全国抗日，反而内战会打得更激烈，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将前功尽弃，毁于一旦。于是党中央、毛泽东经过谨慎、反复研讨，决定在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绝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意见趋于统一。但这一和平方案始终遭到张国焘的强烈反对，他曾多次深夜叩门求见毛泽东，力主杀蒋，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可张国焘叛党后，在《我的回忆》中，却反咬一口，诬蔑毛泽东、周恩来“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⑤抹杀、诋毁周恩来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总是要战胜邪说。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早就大白于天下，张国焘无耻的诽谤是不值一驳的。

张、杨两将军捉蒋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特邀周恩来为代表团团长赴西安协助解决，张并派自己的专机飞往延安迎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这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变变的正确方针，并委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前往西安参加谈判。

张、杨两将军虽然发动了事变，但如何处理蒋介石，心中无数；他们的高级幕僚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决定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还是周恩来到西安后形成的。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斗争，力争把一切抗日救国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首先高度地评价张、杨两将军的爱国热情，赞扬“他们是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⑥当时党中央客观地分析了形势，估计了事变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争取蒋停止内战，争取西安和南京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矛盾，使蒋由内战走向抗战的道路；一种是杀掉蒋介石，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则削弱国力，正中日本侵略者之下怀。周恩来慎重申明，中国共产党力争第一种前途，反对任何新的内战。经过周恩来同志精辟地分析，耐心地说服，张、杨两将军表示完全赞同我党和平

解决事变的主张。周恩来还和张、杨两将军研究了对付南京进攻时的防御，他说，如果南京进攻，必须给予打击，促其反省，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还亲自前往张、杨的中下层部下中作说服教育工作，耐心地解释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他说如果论仇，共产党与蒋最大，但民族的前途不允许我们杀掉蒋介石，我们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西安一隅的抗日局面，我们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我们党的这种以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的高风亮节，使张、杨部下口服心服，接受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周恩来在与蒋方代表宋氏兄妹的谈判中，正式提出了我党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⑦周恩来在谈判中，与蒋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和耐心恳切的说服，充分表明我党的原则立场和寻求和平解决事变以利抗日之诚意。经过两天的谈判斗争，与蒋方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改组国民政府，释放全国政治犯以及同苏联建立合作关系等十项“君子协定”。周恩来又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对蒋进行了十分严肃的说理斗争。周恩来大义凛然，郑重指出，蒋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十年内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目前形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希望蒋认清大局，放弃内战，联合抗日，否则将会成为千古罪人！经过周恩来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蒋最终答应了我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蒋并邀周恩来到南京继续谈判。至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得以实现。

周恩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西安度过了六十多个日日夜

夜，不但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以及蒋方广泛接触，宣传我党抗日主张；而且还和叶剑英等代表团成员分头深入西安各抗日团体、机关、学校，开会、作报告、个别走访，揭露南京亲日派引狼入室的阴谋，密切配合了张、杨的斗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充分显示了周恩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立场，英勇的革命胆略，灵活的斗争艺术，卓越的组织才能，赢得了古城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对叛徒张国焘在所谓“回忆”中对周恩来的诬蔑是最有力的驳斥、回击。

西安事变，是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周恩来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发生的，又是周恩来正确执行我党方针，协助张、杨和平解决的。事变的和平解决，终于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历史性转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再次走向合作的关键，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必要前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西安事变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我们在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的今天，深切地怀念为实现这种历史性转变而作出卓越贡献的周恩来同志。

为了巩固西安事变所取得的成果，尽快实现联合抗战，1937年2月10日，我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指出“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⑧建议以此作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动全面抗战的政治基础。这一通电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及其中间派同亲日派的斗争，促使三中全会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是停止内战的决议案。为了推动国民党在政策上进一步转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动全国的抗日战争，周恩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又和蒋介石及其代表进行了一系列谈判。

1937年2月下旬，周恩来、叶剑英代表我党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谈判，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和苏区问题。国民党代表总是尽力压缩我军编制，不准有

师的建制，只准编三个团，后增至六个团、九个团，人数限制在三至五千人。周恩来提出编四个军、十二个师，共六、七万人。两方相距甚远。为了确表合作诚意，周恩来又作出适当让步，提出必须编为三个师十二个团，每师一万五千人的最后方案，并且红军领导不变。关于苏区，周恩来提出将苏区改为中华民国特别区，实行民选制度，行政人员经选民推荐，由南京政府任命，边区政府设民政、建设、教育、农工、财政五厅，隶属行政院，边区地域包括二十六个县，必须是一个整体，不许分割。国民党代表提出的方案是：边区政府国民党不仅要派人，而且还要任正职，行政机构不准设厅，只准设处，不隶属行政院，只许隶属陕西省。周恩来也作了必要的让步，但蒋方代表始终要求要反共分子掌管边区政权，一直未能达成协议。周恩来返回延安，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遂决定再派周恩来同蒋介石直接谈判。

同年3月下旬，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第二次谈判。周恩来重申了我党坚持苏区行政区的完整，行政人员民主推荐，红军编为三个师和领导不变等项主张，要求蒋切实做出彻底实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蒋在国内外舆论和各派抗日势力的压迫下，不得不表示让步，在红军改编和苏区问题上又表示接受周恩来提出的条件，并同意就合作的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继续举行会谈。

6月，周恩来上庐山和蒋介石举行了两党的第三次会谈。蒋设置了新的障碍，提出先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自任主席，凡事有最后决定权，两党对外活动及宣传由同盟会决定。蒋想以此来“溶化”和消灭我党，实现求之而不得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欲望。周恩来及时洞察蒋的险恶用心，针锋相对地提出必须先讨论、确定共同纲领的主张，并认为这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时翻手如云，覆手是雨的蒋介石翻脸不认他在杭州与周恩来谈判时的承诺，再次提出他要设政训处指挥红军，不准红军设总指挥部，更为荒谬的是蒋要求“毛泽东、朱德留

洋”。周恩来对此毫不让步，据理驳斥，指出：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而不是向国民党投诚，要你们收编。周恩来在整个谈判中始终坚持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又派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再次上庐山与蒋为代表的国民党进行第四次谈判。谈判前夕，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周恩来指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三项基本主张。周恩来将此宣言交给国民党，并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这次会谈是在日本大规模地侵略中国的形势下举行的。蒋又作出了些让步，承认了我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但对国共合作宣言和红军改编等问题仍迟迟不作答复，还在静观形势的发展。

直到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危及到英美在华利益和蒋的独裁统治；同时全国上下抗日怒潮蓬勃兴起，加以我党的批评、推动和督促，蒋也急于要求我党出兵打头阵，才不得不接受我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8月18日，国民党表示同意红军即行改编，同意设总司令部。2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我在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的命令。25日，党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下辖三个师。9月，蒋挑选了四名高级“联络参谋”派往西安，准备派往我军总部及三个师，被党中央拒绝。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周恩来率领我党代表团凯旋返回延安。

三

周恩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几次谈判中，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

步，始终坚持了我党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蒋企图要收编我们的军队，取消边区政权，周恩来坚定地驳斥，明确指出“要把军权、政权交出去，当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事”。^⑨蒋打着“统一军队、统一政令、统一编制……”的幌子，妄想借国共合作之机，把我们党和军队“统一”到他的手里。周恩来对此作了坚决的斗争。他打了一个生动形象而又十分有趣的比喻：

“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象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另外，他们提议，只要你们加进来就好了。我们说，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面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组织。”^⑩蒋介石想利用合作抗战之机，“吃掉”、“溶化”我们的计划成了泡影。

总之，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候，由于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周恩来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进行了正确的斗争，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保持了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使我党能够独立自主，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战的胜利。

本文参考文献

①P208 ⑥P248 ⑦P70—71 ⑨P205 ⑩197—198

以上各注释见《周恩来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

②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P56 中华书局

③胡华、林代昭、清庆瑞《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贡献》，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81年第4期P12

④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周总理光辉的一生》P68

⑤《党史研究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33期—45期，P331、P318

⑧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P237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专科学校）

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 上层的统一战线

任 孟 良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对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并取得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实现全国的对日抗战，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作好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于维护这个合作，推动抗日战争的发展直到取得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周恩来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主持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随后又领导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陪都重庆，对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后，为了巩固和加强这个合作，周恩来高度重视作好国民党上层人士中的民主派的工作。早在1936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给党中央的《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电报中就指出：我们要“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一方面，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另一方面，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条件，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7页）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并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巩